

# 越文化青铜乐器初探

俞珊瑛

(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杭州 310007)

**内容提要:**越文化青铜乐器有铙、甬钟、纽钟、钲钟、句鑃、铎、鼓等,除铙、部分甬钟的年代可拟定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外,其他皆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可分属于越建国前、越国两大时期。越建国前的乐器中,南方风格的铙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而在越国时期的乐器中,出现了成组的中原风格的编甬钟、纽钟等,说明越国的上层贵族已华夏化。

**关键词:**越文化 青铜乐器 类型 年代 特征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越文化遗存以原始瓷、印纹硬陶为主,青铜器多为兵器、农具,青铜乐器的数量虽不多,但却富有特色。本文试对越文化青铜乐器的类型与年代作一分析,并初步探讨其地域特征及文化内涵等相关问题。

## 一 类型与年代

越文化青铜乐器的种类主要有铙、甬钟、纽钟、钲钟、句鑃、铎、鼓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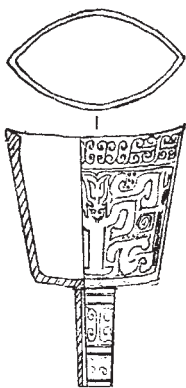
### (一) 铙

目前为止,越地出土的铜铙共有7件。器形大致为合瓦形,平舞,甬中空与腔通,有旋或无旋,钲部或饰纹或有乳丁。根据钲部特征,可分为二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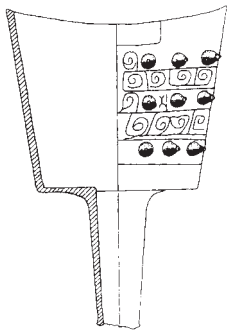
**A型** 2件。甬上无旋,钲部饰纹无乳丁。其中浙江余杭石濂铙<sup>[1]</sup>钲部饰两目凸起的大兽面纹,间有连珠纹,器身满饰云雷纹(图一);浙江金华铙<sup>[2]</sup>钲部饰云纹,中间有两目凸起,外饰有连珠纹边框,鼓部饰变形兽面纹。

**B型** 5件。钲部有36枚乳钉。可分为二式:

**I式** 1件。甬无旋,乳丁呈螺旋状,钲部饰云雷纹。浙江安吉



图一// 浙江余杭石濂出土青铜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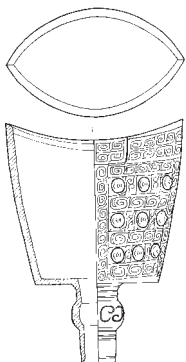
图二// 浙江安吉高禹出土铜铙

A型铙之余杭铙、金华铙分别与湖北阳新刘荣山出土的兽面纹铙与云纹铙<sup>[8]</sup>相同;另外金华铙与江西新干大洋洲064号铙<sup>[9]</sup>、江苏江宁塘东村铙<sup>[10]</sup>等相同。新干大洋洲铙出于商代晚期墓葬,则A型铜铙的年代上限约为商代晚期。

B型I式铜铙与江西德安陈家墩<sup>[11]</sup>铙相同;II式铙与湖南耒阳夏家山<sup>[12]</sup>、衡阳泉口<sup>[13]</sup>,江西万载株云乡<sup>[14]</sup>、新余<sup>[15]</sup>,福建建瓯黄科山<sup>[16]</sup>等地出土的铜铙相同。与I式铙相比,II式铙更接近西周时期的甬钟。高至喜先生认为B型铙的年代为商末周初<sup>[17]</sup>;彭适凡先生认为B型I式铙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而II式铙的年代在商周之际<sup>[18]</sup>;李纯一先生认为B型铙的年代在西周早期<sup>[19]</sup>。而在II式铙中,瓯海杨府山铙出现于一墩一墓、平地堆成的土墩墓中,简报作者认为墓葬的年

收稿日期 2011-07-29

作者简介 俞珊瑛(1981-),女,浙江省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吴越青铜器。



图三// 浙江温州瓯海出土青铜铙



图四// 浙江萧山杜家村出土甬钟



图五// 《宣和博古图》著录的者旨於賜钟

代约在西周中晚期,则B型铙的年代约在商末至西周时期。

## (二)甬钟

据不完全统计,越地出土及见于著录的青铜甬钟共有10件。器形大致为合瓦形,平舞,弧于;甬上有旋、旋上有干,甬实心或有小孔与腔通;钲部有36枚。据甬的形制和钲部特征可将其分为二型。

### A型 可分二式。

I式 1件。旋上有小乳丁,细钮索状干,甬端有一小孔与腔体相通。钲部饰36细长枚,钲、篆间饰有小乳丁状的连珠纹边框,旋饰细阳线纹,鼓部的一面饰螺旋纹。浙江萧山杜家村出土<sup>[20]</sup>(图四)。

II式 2件。旋上无小乳丁,钮索状干较粗,甬端封闭,不与腔体相通,枚较粗。舞部饰云雷纹。主要有者旨於賜钟<sup>[21]</sup>(图五)、浙江东阳李宅双江口出土甬钟<sup>[22]</sup>(图六)。

B型 7件。半环形干;甬实心,不与腔体通。钲、篆、鼓部的正面饰有云雷纹,背面光素。浙江江山出土<sup>[23]</sup>(图七)。

A型I式甬钟之甬中空与腔体相通,旋饰细阳线、乳丁纹,鼓部饰细阳线螺旋纹的特征,具有西周早期器的特点。如陕西宝鸡竹园沟M7、茹家庄M1<sup>[24]</sup>,长安县普渡村<sup>[25]</sup>出土的甬钟等。干作细钮索状,于西周中期器上多见,如陕西扶风庄白1号窖藏甬钟 76FZH1: 59、76FZH1: 64<sup>[26]</sup>等。但同时也不乏本地的特色,如枚十分尖细,与中原地区的不

同。因此A型甬钟是在模仿中原器基础上的本土铸器,其年代上限约为西周中期前后。

A型II式甬钟与浙江绍兴塔山基建工地出土的1件甬钟<sup>[27]</sup>、广东肇庆北岭战国墓出土的6件甬钟<sup>[28]</sup>、广东博罗陂头乡出土的7号钟<sup>[29]</sup>等相同。塔山甬钟正反两面的鼓部皆铸有鸟虫书铭文,曹锦炎先生考证为春秋晚期的徐国青铜器<sup>[30]</sup>。又者旨於賜为越王句践之子,活动于战国初期,则A型II式甬钟的年代应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

B型甬钟仅在正面施有纹饰,舞部纹饰后半面简省甚至光素的特征,在湖、广等地的春秋战国时期遗存中常见,如湖北广济鸭儿洲江底<sup>[31]</sup>、广东清远马头岗墓葬<sup>[32]</sup>出土的甬钟,其中鸭儿洲编钟伴出有句鑃,年代在春秋晚期<sup>[33]</sup>,马头岗M1的年代为春秋晚期、M2为战国早期,则B型甬钟的年代可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 (三)纽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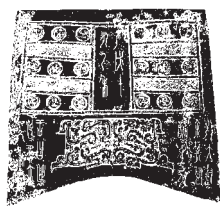
共12件,即者沪编纽钟。形制相同,大小相次。为椭圆体;扁条形长方钮,上饰双头龙纹;平舞,饰有卷云纹;钲部36枚,枚饰火纹,枚的界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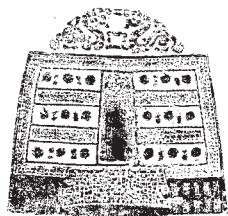
图六// 浙江东阳李宅双江口出土甬钟



图七// 浙江江山出土编甬钟(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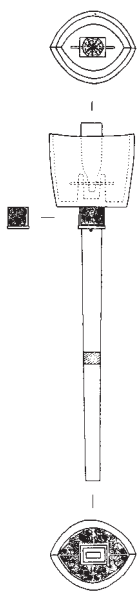
图八// 上海博物馆藏者沪钟



图九// 能原铸



图十// 其次句钟



图十一// 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出土铎

饰绶纹;篆间饰三角回首龙纹;鼓部饰交叠龙纹。钲的正背面及鼓部两侧均铸鸟虫书铭文,全铭为92字。传河南洛阳金村古墓出土,后大多流出国外(图八)<sup>[34]</sup>。

同类器尚多见于江淮地区的徐、吴、楚等国的墓葬中。如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徐墓出土的9件组钟<sup>[35]</sup>、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吴墓出土的9件组钟<sup>[36]</sup>,以及河南浙川下寺M1<sup>[37]</sup>等楚墓出土的9件一组的组钟等,除纹饰略有差异外,形制皆相同。以上墓葬的年代都在春秋晚期。

关于器主的推定,各家说法不一。郭沫若先生释为越王翳之子“诸咎”,容庚先生认为是句践之子“与夷”,饶宗颐先生认为是句践之大夫“柘稽”,或作“诸暨柘”<sup>[38]</sup>。陈佩芬先生认为者沪是句践之大夫,“越十有九年”即越王句践十九年,公元前478年<sup>[39]</sup>。本文从陈佩芬先生的观点。

#### (四) 铸钟

共3件,形制皆相同。合瓦形,平舞,平于;交龙纹繁钮;钲、篆以绶纹为界,舞、篆、钲、鼓部饰细密的蟠虺纹,乳饰阴线螺旋纹;钲间、鼓侧铸有铭文。其中能原铸2件,甲器出土于江西临江县,乙器出土于江西高安县(图九);者沪铸1件,与前述12件者沪编组钟成组。能原铸甲器铸铭60字,乙器48字,但并非全铭,推测全铭应有120字,这套铸也应不少于8件<sup>[40]</sup>。者沪铸为全铭,75字。

同类器也见于江淮地区的钟离、蔡、楚等国的

墓葬中。如安徽卞庄钟离国M1出土的7件铸钟<sup>[41]</sup>、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8件铸钟<sup>[42]</sup>、河南浙川下寺M10出土的8件铸钟<sup>[43]</sup>等,除纹饰略有差异外,形制皆相同。以上器物的年代均在春秋晚期前后。

据曹锦炎先生考证,能原铸的内容为越国灭吴以后北上,主持泗上诸侯莒、邾国分界之事,为越王句践的晚年,约公元前473年稍后<sup>[44]</sup>。者沪铸既与者沪钟同组,则年代应相当,也为春秋晚期器。

#### (五) 句钟

目前为止,越地出土的句钟共有9件。形制皆相同。合瓦形,腔体较瘦长,侈铉,凹口;扁方甬,近舞处突出似甬座。有的甬部饰蟠虺纹,腔体近舞处饰云雷纹、三角纹。为浙江德清武康镇出土的7件其次句钟<sup>[45]</sup>(图十)、江苏常熟翼京门外出土的姑冯句钟<sup>[46]</sup>、浙江东阳李宅双江口出土句钟<sup>[47]</sup>。其次句钟中有2件器身两侧刻30字铭文,姑冯句钟刻39字铭文,东阳江句钟器表光素、无铭文。

同类器多见于春秋时期的吴越地区,如江苏武进淹城出土7件句钟<sup>[48]</sup>、浙江绍兴城关狗头山出土2件配儿句钟<sup>[49]</sup>、皖南出土14件句钟<sup>[50]</sup>,此外在湖南、湖北、山东等地也有零星发现。可知句钟当为吴越文化特有的器类。

其次其人无考。姑冯,据多家考证,为句践臣姑冯舌庸之子冯同,也作逢同<sup>[51]</sup>,活动于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另外,形制、纹饰皆与其次、姑



图十二// 浙江富阳出土铎

冯两器相同的配儿钩鐃,据沙孟海先生考证,配儿即吴国的太子波,亦即吴王阖闾之子终累,为吴王夫差之兄,活动于春秋晚期<sup>[52]</sup>。综上,这9件句鐃的年代应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

#### (六)铎

据不完全统计,越地出土的铎共有5件。皆合瓦形,体短阔,口凹弧或略凹弧,平顶,中有方釜。仅口部与纹饰不同,可分成二式。

I式 4件。口略有凹弧,腔体内有凹形卡口,顶部、方釜外侧饰有小圆点为地纹的卷云纹、几何纹。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出土<sup>[53]</sup>,出土时釜内尚有一木柄,一侧依稀可见文字(图十一)。另外绍兴市区尚零星出土3件,形制相近,现皆藏于绍兴市博物馆。

II式 1件。口凹弧,方釜用榫卯插销固定,铎身两面左右对称框内饰有小乳丁纹。浙江富阳富春江两岸出土<sup>[54]</sup>(图十二)。

I式铎的形制与安徽青阳县庙前镇龙岗岱山出土的雷纹铎<sup>[55]</sup>、吴王光铎<sup>[56]</sup>等相同。青阳庙前龙岗墓葬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吴王光铎侧面有“攻吴王光,作得其吉金,自之用”铭文,光为夫差之父阖闾,也为春秋晚期器。可知I式铎的年代应在春秋晚期。

II式铎铎身两面左右对称框内饰小乳丁纹的特征,与江苏丹徒谏壁青龙山出土的锥刺纹铎<sup>[57]</sup>相近,但布局不同。这类小乳丁纹也见于郢郢率铎<sup>[58]</sup>、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铎<sup>[59]</sup>等器上,郢郢率铎为战国早期器,雨台山楚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则II式铎的年代约在战国早中期。

#### (七)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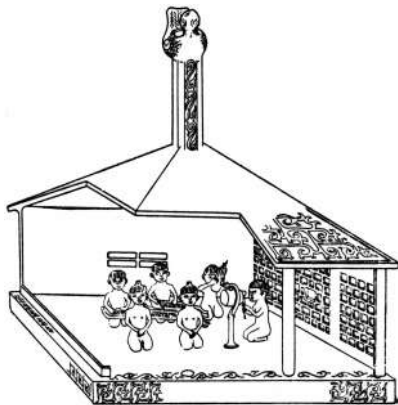
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有1件模型鼓<sup>[60]</sup>,在一伎乐铜屋内(图十三),其六人俑中左边一人击鼓。该鼓为圆桶形,吊悬,柱的上端弯曲成倒钩形;鼓座圆形,圈足、直壁,中有管柱。演奏者面

向西,右手执一槌击之,其在整个乐队中的地位独特(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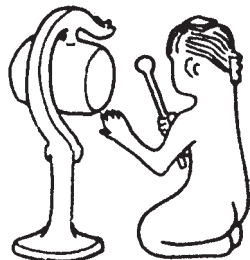
绍兴M306的族属、年代颇有争议,主要有春秋晚期的徐人遗存说<sup>[61]</sup>、战国初期的越墓<sup>[62]</sup>说等。此件伎乐铜屋造型奇特,不见于其他地区。而铜屋内的人俑形象,在吴越地区非常流行,如绍兴漓渚<sup>[63]</sup>、吴兴(今属湖州)埭溪<sup>[64]</sup>、德清武康龙山<sup>[65]</sup>出土杖斂人像等,造型皆相近。另外铜屋立柱上所饰的大尾之鸟,也与上述鸠杖顶的鸟饰相同,则伎乐铜屋当为越国风格器。

与M306模型鼓形制相近的实物,尚见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该鼓桶形,正中对开一孔,贯以木柱将其载起,圆形鼓座,底沿四周有4个活环<sup>[66]</sup>。此外,在中原地区多见有同类的鼓座,如河南叶县M4<sup>[67]</sup>、山西太原金胜村M674、上海博物馆藏的两件晋式龙纹鼓座<sup>[68]</sup>等。曾侯乙墓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其他鼓座的年代皆为春秋晚期,则此类鼓流行于越地的年代当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绍兴地区还出土有5件悬鼓环<sup>[66]</sup>,出土时间不一,皆为悬鼓之构件。1件椭圆形环与方座相连,方座可转动,座头由4个跽坐人俑组成,皆椎髻,身、腿上饰云纹(图十五),与江苏丹徒北山顶



图十三// 绍兴M306出土伎乐铜屋



图十四// 绍兴M306铜屋内的击鼓俑





图十五// 绍兴出土悬鼓环

出土的1件<sup>[70]</sup>形制完全相同,推测同为吴越文化特色的青铜乐器构件,流行于春秋晚期。另外4件为方形,中有二穿孔,整体饰蟠螭纹。其中一组有衔环穿环,一边缘内折;另一组穿环已佚。同类器多见于战国楚墓中,如湖南长沙M350:4、M350:3两件扁圆鼓上的方形铜环<sup>[71]</sup>,河南信阳长台关M1出土大鼓上的方形铺首铜环<sup>[72]</sup>等。根据此类鼓环的弧度,推测应为大扁鼓,其年代也应与长沙、信阳鼓大体接近,约在战国中期前后。

#### (八)其他

绍兴M306伎乐铜屋内,尚见有乐器琴、筑、笙模型。铜屋第二排居左一琴俑,跪坐,琴置于膝,双手抚琴,作演奏状。琴无明显岳山,琴首向右翘起,演奏时右手小臂靠于其上;琴末端向下,可置于地。铜屋第二排居中一人为筑俑,跪坐,置筑于膝,左手按弦,右手执一小棍击弦。筑的两端翘起(图十六)。铜屋后排东边尚跪坐有一俑,捧笙而吹。该笙管长短不一,中间一管较长。吹管为喇叭口,状似葫芦(图十七)。

以上虽皆为青铜质模型,但也应有实物作蓝本,可推知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地必有此类琴、筑、笙竹木乐器的存在。另外考古发现的琴、筑、笙实物,也多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如湖南长沙战国晚期楚墓出土的彩绘琴<sup>[73]</sup>、江西贵溪仙岩战国早期墓出土的十三弦筑<sup>[74]</sup>、湖北当阳曹家岗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两件笙<sup>[75]</sup>等。以上的琴、筑、笙实物皆为漆木器,笙斗则由葫芦制成,笙管为长短不一的细竹管。

此外,越国的青铜乐器尚有江苏吴江出土的越王於字钟残片<sup>[76]</sup>,形制不明,《殷周金文集成》订为春秋晚期。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一著录有一件朱句钟<sup>[77]</sup>,宋代出土,具体形制无载。朱句即越王翁,公元前448~前412年在位,为战国早期。

另外,战国时期的越地往往有原始瓷仿青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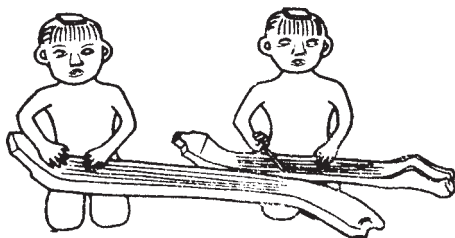
乐器罍于、丁宁出土,虽然目前没有找到相应的实例,但可推知当时应该有这类乐器流行。

## 二 相关问题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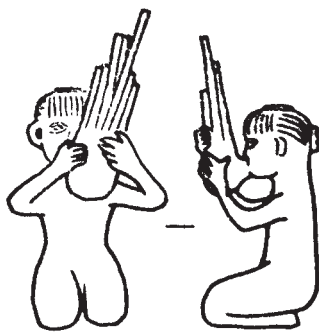
以上青铜乐器中,除了铙、A型I式甬钟为商和西周时期器外,其他乐器的年代皆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越国的建立始于允常,时在春秋晚期。《史记·越世家·正义》引《舆地志》云:“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至战国楚威王时,“兴兵而伐之,大败越……而越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则以上青铜乐器可分属于越建国前、越国两大时期:前者包括铙、杜家村甬钟;后者有其它甬钟、纽钟、钲钟、句鑃、铎、鼓等,而后者又以强盛时期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器居多,其中者沪编钟、能原钲钟、其次句鑃、姑冯句鑃等,都是句践时器。句践为越王允常之子,公元前496年~前465年在位,活动于春秋末至战国初。

越文化青铜乐器中,南方风格器与中原风格器共存。其中具有南方地区特征的乐器有铙、句鑃、铎等。

铙在商周时期广泛流行于今天的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学者们一般认为南方的大铙是从商代中原的小铙演变而来,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sup>[78]</sup>。句鑃最常见于春秋时期



图十六// 绍兴M306铜屋内的抚琴俑、击筑俑



图十七// 绍兴M306铜屋内的吹笙俑

的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大多数学者认为句鑃是南方大铙的一种变体,而春秋时期吴越句鑃的制作可能是后来兴起的一种仿古的趋势<sup>[79]</sup>。早期铎主要出现在西周时期的中原地区,但数量不多,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吴越地区以及今天的湖、广等地,并在形制上与中原的西周器有较大的差异<sup>[80]</sup>,显然具有较强的南方特色。

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乐器有甬钟、纽钟、钲钟、鼓等。

钟为周代礼乐最重要的乐器,其中甬钟、纽钟最早皆集中出现于周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即陕西的关中地区。越文化的甬钟等虽大都经过本土的改造,但仍然体现了近中原文化的特征。铜钲发源于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基本上集中在今天的湖南、江西一带,为中原所少见,春秋早期以后在中原地区也大量使用,并与甬钟、纽钟一起成为北方晋系青铜礼乐器中常见的乐钟,流行于整个东周时期<sup>[81]</sup>。因此甬钟、纽钟、钲钟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的典型器类。

鼓、琴、筑、笙皆属传统器类。鼓虽不乏本土特色,如M306模型鼓系吊悬、鼓柱的上段弯曲,但鼓本身的形制与中原的建鼓没什么两样。而琴、筑、笙的实物虽多见于南方,但竹木之器不易保存,可能是少见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原因。事实上M306铜屋内的鼓、琴、筑、笙,皆属中原雅乐的伴奏乐器。如鼓,《周礼》云:“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天子、诸侯用钟、钲、鼓、磬;而大夫、士则只能用鼓,无钟、磬。如笙,《仪礼·燕礼·记》云:“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笙入三成。”诸侯燕礼用三首笙歌,大夫、士则无。另外在《诗经》中多次提到的雅乐伴奏乐器,尚有琴、筑、瑟、箫等<sup>[82]</sup>。

综上,越建国前的青铜乐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南方风格器铙,可见其时占据最重要地位的是地方音乐文化体系;越国时期的乐器中,南方风格器仅有句鑃、铎等,而中原风格器有成组的甬钟、纽钟、钲钟等,说明其时越国音乐文化中已具有十分浓厚的中原文化因素。

越地的音乐文化,风格独具,且有古老的传统。据《吕氏春秋·遇合》载:“客有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南朝梁任昉《述异记》也云:“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皋,三人披发而舞。”文献记载的内容虽指向模糊,时间也不甚明确,但越地本具有浓厚的土著音乐文化特

色,与中原文化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则是可以肯定的事实。然而从考古资料来看,这种状况至春秋晚期以后已有了改变,成组的中原文化特征的编钟、雅乐伴奏乐器的出现,无不证明越国的上层贵族已开始华夏化。史载越国在允常称王之后强盛,句践时期实力大增,并于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之后北上与诸侯会盟,横行于江、淮之间,一时成为东方的霸主,并将都城迁到山东琅邪(今江苏赣榆北)<sup>[83]</sup>,直到战国越王不光时期才迁回南方的吴故都(今江苏苏州)。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这种对中原礼乐文化的认同,以上层贵族为首的越国统治者率先实行华夏化,进而以华夏文化改造土著文化<sup>[84]</sup>,为越国于春秋末年迅速强盛并在战国初期称霸中原作了意识形态上的准备。

- 
- [1]王士伦:《记浙江发现的铜铙、釉陶钟和越王石矛》,《考古》1965年第5期。
  - [2]金华市博物馆藏。
  - [3]周意群:《安吉发现一件西周时期铜铙》,《文物》2005年第1期。
  -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长兴县出土的两件铜器》,《文物》1960年第7期。
  - [5]长兴县文化馆:《浙江长兴县的两件青铜器》,《文物》1973年第1期。
  - [6]赵一新:《浙江磐安深泽出土一件云纹铙》,《考古》1987年第8期。
  - [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
  - [8]咸博:《湖北省阳新县出土两件青铜铙》,《文物》1981年第1期。
  - [9]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80页。
  - [10]南波:《介绍一件青铜铙》,《文物》1975年第8期。
  - [1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县陈家墩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 [12]蔡德初:《湖南耒阳出土西周甬钟》,《文物》1984年第7期。
  - [13]周新民:《湖南衡阳出土西周甬钟》,《文物》1985年第6期。
  - [14]刘建等:《万载县出土西周甬钟》,《江西历史文物》1994年第1期。
  - [15]余家栋:《江西新余连续发现西周甬钟》,《文物》1982年第9期。
  - [16]王振铎:《福建瓯县出土西周铜钟》,《文物》1980年第11期。

- [17]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辑刊》第2集,岳麓书社1984年。
- [18]彭适凡、孙一鸣:《浙江温州瓯海杨府山土墩墓的年代》,《考古》2011年第9期。
- [19][33][58][80]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35~142、229、307、302~309页。
- [20]张翔:《浙江萧山杜家村出土西周甬钟》,《文物》1985年第4期。
- [21]曹锦炎:《越王钟补释》,《国际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 [22][47]朱杨晓:《东阳市博物馆藏春秋战国青铜器》,《东方博物》第4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 [23]柴福有:《浙江江山出土青铜编钟》,《文物》1996年第6期。
- [24]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强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6~97页。
- [2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 [26]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 [27]蒋明明:《浙江绍兴市发现一件春秋铭文铜甬钟》,《考古》2006年第7期。
- [28]广东省博物馆、肇庆市文化局:《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 [29]邱立诚、黄观礼:《广东博罗出土一组青铜编钟》,《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
- [30]曹锦炎:《自铎铭文考释》,《文物》2004年第2期。
- [31]湖北省博物馆、广济县文化馆:《湖北广济发现一批周代甬钟》,《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 [32]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清远的东周墓葬》,《考古》1964年第3期。
- [34][39]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0~222页。
- [35]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5期。
- [36]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年第3期。
- [37][4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79~93、257~276页。
- [38]转引自董珊:《越者沪编钟新论》,《东南文化》2008年第2期。
- [40][44]曹锦炎:《再论“能原”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3期。
- [4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局:《凤阳大东关与卞庄》,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9页。
- [42]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0页。
- [45]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56页。
- [46]清·吴式芬:《攷古录金文》三之一·12,吴氏家刻本,1895年。
- [48]倪振逵:《淹城出土的铜器》,《文物》1959年第4期。
- [49]绍兴市文管会:《绍兴发现两件鉤鑑》,《考古》1983年第4期。
- [50]冯伟:《皖南出土青铜句鑑的类型和年代分析》,《东方博物》第36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 [51]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一号,科学出版社1959年。
- [52]沙孟海:《配儿鉤鑑考释》,《考古》1983年第4期。
- [5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2~34页。
- [54]周仁花:《富阳文物馆藏的几件先秦青铜器》,《东方博物》第3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 [55]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90、191页。
- [56]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藏。
- [57]江苏省丹徒考古队:《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及附葬墓发掘报告》,《东方文明之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 [59]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89页。
- [60]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 [61]曹锦炎:《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4年第1期。
- [62]牟永抗:《绍兴306号墓刍议》,《文物》1984年第1期。
- [63]1990年绍兴漓渚中庄村坝头山出土,现藏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 [64]《文博简讯·浙江省》,《文物》1972年第3期。
- [65]周建忠:《德清出土春秋青铜杖头考识》,《东方博物》第13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 [66]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 [67]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叶县文化局:《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9期。
- [68]周亚:《鼓座、建鼓及其他》,《上海文博论丛》2008年第3期。
- [69]绍兴市博物馆藏。
- [70]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
- [71]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75、378页。
- [7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图二七~三二。
- [73]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五里牌战国木椁墓》,《湖

南考古辑刊》第1辑,岳麓书社1982年。

[74]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12期。

[75]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76]陈邦福:《吴江横塘出土越王残钟考释》,《考古》1961年第7期。

[77]中华书局编:《宋人著录金文丛刊初编》,中华书局2005年,第324页。

[78]向桃初:《南方商周铜铙的分类序列和年代问题》,《湖

南省博物馆馆刊》第3辑,岳麓书社2006年。

[79][82]陈致著、吴仰湘等译:《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30、168~171页。

[81]陈阳、戴哲涛:《中国财税博物馆藏滕侯跋之歌钟考》,《东方博物》第36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83]刘和惠:《楚文化的东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9、110页。

[84]刘彬徽:《吴越地区东周铜器与徐楚铜器比较研究》,《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两木出版社1997年。

## A Primary Study on the Bronze Musical Instruments of the Yue Culture

YU Shan-ying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Hangzhou, Zhejiang 310007)

**Abstract:** The bronze musical instruments from the Yue Culture include the *Nao* (a large cymbal), *Yong Zhong* (a bell with a cylindrical handle on top), *Niu Zhong* (a bell with a semi-circular knob on top), *Bo Zhong* (a bell with a plane opening), *Gou Diao* (used at sacrificial ceremonies or feasts), *Duo* (a hand-bell with clapper) and *Gu* (drum). While the *Naos* and some of *Yong Zhongs* are likely to be dated to the late Shang through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others were all from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rough the middle of the Warring States, which may be grouped as of the Pre-Yue and Yue periods. The *Nao* with a southern style, was the most prominent musical instruments of the pre-Yue time. When it came to the Yue time, the *Yong Zhong* and *Niu Zhong*, which appeared in sets and with a Central-Plain style, started to be seen indicating that the nobility of the Yue State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Central-Plain.

**Key words:** Yue Culture, bronze musical instrument, genre, date, character

(责任编辑:毛 颖)

## 《〈东南文化〉200期目录索引》征订启事

《〈东南文化〉200期目录索引》收录了《东南文化》自创办至第200期(即《文博通讯》1975年第1期~《东南文化》2007年第6期)的全部篇目,按学科、研究领域及内容等分类,共分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民俗学、文物研究与鉴赏、建筑与园林、书刊评价与学术动态、知识介绍及其他、图版等十一部分;另附录有作者姓名索引与《东南文化》2008、2009年目录索引。《索引》内容全面、分类科学,是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及遗产研究与保护、文化史论、艺术史论、宗教文化、建筑文化等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考古文

物爱好者检索、查阅的工具书。

本书装帧印刷精美大气,为大16开本,257页,订价68.00元。需要者可直接向编辑部订购。本刊在收到订单及书款后,即时邮发。

**通信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

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社

**联系人:**何 刚

**邮政编码:**210016

**电 话:**+86-25-8480 6201

**E-mail:**dnwh@chinajournal.net.cn